

第一章 緒論

本文探討元代儒者鄭玉的思想，本章為全文的緒論，目的在說明下列各章的討論背景。以下共分成三節。第一節說明論文的研究動機，第二節回顧現有的研究成果，第三節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第四節對鄭玉所處的學術環境及重要著作做一提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本論文希望透過元代重要的思想家——鄭玉，以他的學說作為研究對象，期望能在個案研究中窺得元代思想發展的一個側面，藉此研究成果對元代思想發展作一個案的觀照。

近代學者探討中國思想史或宋明理學時，常常只以宋代與明代思想來言理學的發展，夾於宋、明間的元代學術究竟是何面貌？這是本文關心鄭玉思想的一個起點。之所以選擇活動於元代中後期的鄭玉（1298—1358）為研究元代儒學的對象，是因為他留存於文獻中所展現的思想特色。這些特色明顯地有來自於六經的影響，也有延續宋儒的地方；而對於宋代理學，鄭玉針對朱陸之爭產生的見解也是值得關注的焦點。

元代的國祚很短，鄭玉的學術活動時間處在元代政治穩定到滅亡這一段時間。一般來說，學界對於南宋到元初的儒學發展有大概的認識，但是元代中期以後的儒學較少人作專門的研究。因此，透過對鄭玉思想的觀察，不僅可以窺得元代中後期儒學發展的一種樣貌，也能以之推斷鄭玉前後儒學發展的特色。

鄭玉雖然為漢族，從他的著作當中得見他以元朝人自栩¹；而就他的學術活動時間來看，他算是一典型的元代思想家。目前除了數篇期刊以某個切入點對鄭玉的忠義行為、思想分期作介紹之外，尚未有討論鄭玉思想義理的專著問世。因此，以鄭玉的思想為題，以他的著作為主要材料、參酌相關文獻以及前輩學者的研究，盡力還原鄭玉在思想史上的歷史地位將是本論文的发展重點。

¹ 「伏觀至元十三年，國家渡江取宋，其君后既就臣虜，宗社已為丘墟，獨丞相文天祥以亡國之遺俘，立當時之人極。從容就死，慷慨不回，義膽忠肝，照耀日月，清風高節，蕩滌寰區，豈惟作軌範於一時，實可為儀刑於千古」，〈為丞相乞立文天祥廟表〉，《師山遺文》，卷3，頁1-2。

學界普遍以為元代沒有發展出創造性的思想觀念，如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指出元代經學的發展屬於積衰的狀態。²但是對元代儒者而言，可不可能保存傳統比創造新的思想脈絡更為務實、重要。相較於之前的儒學而言，這個時代保存了什麼、改變了什麼？如果這些問題不釐清，就不容易了解元代的學術風貌，對於中國近世儒學之發展，也不能有一較完整的理解。

多數學者對元代儒學的了解，主要以元初趙復北傳以後的朱學發展為研究大宗。若將元代儒學以鄭玉為發散點，向前可追溯元初儒者是否承接了宋代的儒學傳統；向後可以探問元代儒學是否漸漸自成一格，而發展出嶄新的學術風貌。然而，特為人所關心的朱陸之爭，在元代九十年的時間裡是否得到了解決？深一層來究問：元代朱、陸「會同」的發展與明代思想的發展方向，是否具有密切的關係，這也是一個值得再深入研究的問題。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目前學界對於元代儒學的討論數量很少，對於鄭玉的研究則僅限於單篇論文或單一問題的討論，多數的宋明理學史甚至一筆帶過鄭玉的學術貢獻。因此，本節除了介紹罕見的鄭玉研究，還需要從各種不同性質、方向的著作中提掣出與其思想發展相關的文獻。以下依照與本論文相關的緊密度，將前賢相關的研究成果分為：鄭玉個案研究、與鄭玉相關的文獻討論、鄭玉所處之學術環境的形成與儒學發展三部分做文獻回顧。希望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下，得知身處元代學術環境中的鄭玉是如何開展他的思想。

一、鄭玉個案的討論

有關鄭玉的個案討論，就目前筆者所查索的資料來看，以全祖望補本的《宋元學案》為最早。學案第九十四卷裡，有以鄭玉為首的「師山學案」。³從全祖望在師山學案中所收的篇章來看，⁴可知他所關注的焦點為：鄭玉思想中的「朱陸

² 皮錫瑞，「宋以後，非獨科學文字蹈空而已，說經之書，亦多空衍義理，橫發議論，與漢、唐注疏全異……論經學，宋以後為積衰時代」，《經學歷史》（台灣：漢京文化，1983.9月），頁274-275。

³ 全祖望在文中言及：「繼草廬而和會朱陸之學者，鄭師山也。草廬多右陸，而師山則右朱，斯其所以不同，述師山學案」。明·黃宗羲著／清·全祖望補本，《宋元學案》（台北：中華書局，1984），卷94，頁1。本論文援引之《宋元學案》皆由此版出，以下不再標列編者、出版項。

⁴ 同前註，〈與汪真卿書〉、〈周易大傳附註序〉、〈春秋經傳闕疑序〉、〈餘力稿自序〉、〈送徐推官序〉、〈送葛子熙序〉、〈王居敬字序〉、〈跋太極圖西銘〉，卷94，頁1-3。

會同」、對《易》的體認、⁵以及《春秋闕疑》⁶寫作的目的等三部分。全祖望以學術史的方式，擇其以為最精華的部分，從《師山集》中的重要文本及後人所寫的行狀來定位鄭玉的學術特色，最末再補充講友、師侶與其交遊的狀況。從《宋元學案》〈師山學案〉中輯錄的文章可以看出鄭玉的學術思想的大概，亦頗能將讀者「導入」思想家的思想。研究者要掌握線索又不被線索所限制，必須對學案中人物所言、所為做原典的查核。

除此之外，單獨介紹鄭玉的著作僅見於單篇論文。多數論文涉及思想討論的篇章不多，多半集中於鄭玉生平的介绍與其仕隱的抉擇。然而，劉桂林〈鄭玉教育思想新探〉⁷一文是其中的例外。此篇內容點出了幾個問題：其一是鄭玉的學術性格是重「事」大於重「理」，其二是其在學問上以「道問學」為主軸，卻不將朱陸學說做涇渭之判。文中關注的是鄭玉的儒學內容，強調鄭玉對當時學風不夠篤實所作的批判，也論斷在「學」與「用」上，鄭玉是主張知行統一的學者。在朱陸會同的問題上，劉桂林以為鄭玉吸收了陸學思想的認識與心理條件，鄭玉以朱學循序漸進、讀書博覽的下學工夫為策略，進行對朱、陸兩家學說的兼取調和。這篇研究以《師山集》為主要材料，並以《宋元學案》卷四十七做補充說明，雖然將鄭玉定位為元末中後期理學教育的代表，但是論文內容卻對鄭玉的教學行為缺少著墨，因此，全篇在論述上仍有補充的空間。

1997年劉祥光發表了〈從徽州文人的隱與仕看元末明初的忠節與隱逸〉⁸一文，此篇論文以鄭玉的仕隱出處為討論重心。全文除了以鄭玉的仕隱出處、論學主張、思想特色來做思想介紹之外，論文還產生另一寬泛的討論重心，即宋代知識份子「為己之學」與元代知識份子「以道自任」的差異。文中舉了劉因、吳澄等人加以論述，稍微削弱了鄭玉在這篇論文中本來可以被凸顯的形象。另外，我推測劉祥光應該是接受了《元史》將鄭玉入忠義傳的說法，⁹對鄭玉死節一事也

⁵ 《宋元學案》引自《師山集》〈周易大傳附註序〉，「天地一易也，古今一易也，吾身亦一易也。以吾身論而之心者，易之太極也；血氣者，易之陰陽也；四體者，易之四象也；進退出處之正與不正，吉凶存亡之所由應者，易之用也」，見《師山集》，卷3，頁2。

元·鄭玉，《師山集》內含《師山集》八卷、《師山遺文》五卷、《師山遺文附錄》數十篇（《師山集》（四庫全書珍本四集，v.300，臺灣商務，1973）。本篇論文所引《師山集》多由此版本出，若遇版本不同而有重要歧異，將另外標注。

⁶ 元·鄭玉，《春秋闕疑》四十五卷（四庫全書珍本三集，v.84-89，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本篇論文所引《春秋闕疑》全由此版本出，以下將不再標列作者、出版項。

⁷ 劉桂林，〈鄭玉教育思想新探〉，《孔孟月刊》，31卷第9期，1993.5，頁36-38。

⁸ 劉祥光，〈從徽州文人的隱與仕看元末明初的忠節與隱逸〉，《大陸雜誌》，94卷第8期，1997.1，頁32-43。

⁹ 宋濂將鄭玉擺入《元史》列傳第83，忠義四。明·宋濂，《元史》（臺北：中華書局，1966出

持正面的看法。依個人淺見，鄭玉是「隱於元朝」、「不仕明朝」，仕隱的朝代和性質與劉因、吳澄等元初學者形象不一致，對於隱或仕的抉擇判準也未必與劉因、吳澄相同，我認為應就此有所區隔。

1998年韓志遠發表〈元代著名學者鄭玉考〉¹⁰一文，作者則以《元史》將鄭玉寫入〈忠義傳〉，卻不入〈儒林傳〉為思考點，再由《元史》修纂的狀況來推究在《元史》內的鄭玉傳為何人所作。論文以元代汪克寬的〈師山先生鄭公行狀〉為重要考證資料，並參酌鄭玉的著作，討論鄭玉應為「忠義之士」還是「儒林學者」的問題。

韓志遠與其它學者最大不同點在於：他對鄭玉學思歷程轉折有自己的看法。作者並不採取大部分學者以為的「早年學陸、後期轉朱」，或是「由陸入朱，朱陸合會」如此單純的觀察，而是將鄭玉的思想轉變分為十八歲以前、十八歲到三十五歲、三十五歲到五十歲、五十到六十歲四個時期。作者以歷史事件與鄭玉之詩文的寫作時間當作考證根據，將鄭玉的思想轉折歷程歸納成陸學——朱學——朱陸合會——朱學四階段。

以上的資料提供了幾條參考路徑。從學術發展脈絡來談，全祖望已指出鄭玉與朱陸會同的關係，加以深究便能突顯出鄭玉在思想史上可能的位置，當然，這是在於我們肯定了宋代以來，朱、陸學問各為學術史上重要學派的前提下所做的觀察。劉桂林將鄭玉視為教育家，其論述集中於「教育思想」未能全面突顯出鄭玉的整體思想；後輩研究者若能從文本分析入手，當能立體的呈現出鄭玉的思想全貌。劉祥光的論文則是以徽州為討論區域，文章重心著重於中國歷史上知識份子仕與隱的出處、抉擇，也以歷史學者的角度來看徽州鄭玉的志節。韓志遠的論文將〈忠義傳〉與〈儒林傳〉所收之人作了分析、判讀，並據此認為以鄭玉的學術成就而言，理當入〈儒林傳〉。同時他對於大部分的理學史、單篇朱陸合會的論文將之歸類於「由陸入朱」或「由朱入陸」的人物，提出了另外四階段學思變合的說法。以上分期的根據應該是從鄭玉的著作而產生的歸納結果。而在此研究之上，本論文將以謹慎的態度重新考證鄭玉各篇章著作的時間，客觀地呈現鄭玉朱陸會同思想發展的脈絡。

版，1997.7，第六刷）。本篇論文所引《元史疑》全由此版本出，以下將不再標列作者、出版項。

¹⁰ 韓志遠，〈元代著名學者鄭玉考〉，《文史》第45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9），頁125-137。

二、與鄭玉相關的文獻研究

此部分的研究，雖然不是以鄭玉為主角，然而這些論述提供了本研究中各章節中所需要的參考，因此也納入文獻回顧探討論範圍。以下分述各文獻的概要：

徐遠和《理學與元代社會》，¹¹第一章立為「元初理學的傳播者」，第二章到第六章則以學派來分章，在第六章徽州學派之後別立第七章「元代陸學」。徐遠和做這樣的章節安排，是有意識地將學術發展的時間與性質一併考慮。在介紹各個學派時又兼論朱學、陸學、朱陸合流這三種學術風貌大致的發展。鄭玉被徐遠和歸類於徽州學派，在時間上屬於「理學發展停滯期」。這段時期徐遠和列舉的兩位徽州學人——鄭玉、趙汭，都有《春秋》經注，故均以「注春秋」為向下深掘的切點。

換言之，徐遠和是以經學思想史的角度梳理徽州學派於元末的學術發展。也因為這個緣故，徐遠和較少深刻地涉及經學以外的學術思想。鄭玉的《春秋經傳闕疑》被放在徽州學派第一節來討論。錢穆曾在《朱子學提綱》提到：「經學之與理學，貴在相濟，不在獨申。合則兩美，分則兩損。」¹²這種見地或可說明徐遠和做出此安排的原因。徐遠和論述鄭玉的重心依順序為《春秋闕疑》要旨、以心求本、倫常出處、朱陸合會四小節，除了第一節是經學的討論，二、三、四都屬於理學的範疇。作者涵蓋的層面已經算是寬泛，在目前可找到的專書或論文中，此章節最有系統，也是最能站在文本上說話的文獻。

百卷本《中國全史》的《中國元代教育史》¹³對於鄭玉有莫約六千多字的討論，由歐陽周撰寫。作者就其生平與教育活動、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形構出一個教育家的形象。從內容來看，歐陽周這部分的討論講述了鄭玉許多學道、行道的主張。他指出：鄭玉以「德行爲本」作為教育思想，以治學應以知曉大本大原爲旨。歐陽周指出了鄭玉將六經視為聖人之道，不過，這裡的六經包括了《春秋》三傳。鄭玉有以史爲鑒的傾向，也強調學友間的切磋互助，雖然歐陽周沒有引文來說明學友間的交遊狀況，但這部分可從《師山集》中不少應酬答贈的詩文中得到印證。

¹¹ 徐遠和，《理學與元代社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¹² 錢穆，《朱子學提綱》，（台北市 素書樓基金會出版，2001），頁 31。

¹³ 歐陽周，《中國元代教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

百卷本《中國全史》的《中國元代思想史》¹⁴有八章，由秦志勇編寫。第六章陸學的傳播僅用六頁來記述，總體來說，作者是以朱學為中心來討論元代思想的發展，八章中並未特立一章來論述朱陸會同的狀況。本書提到「鄭玉」此人只有一處，是在第一章概述。不過，在論及各學派中有「偏陸」思想的思想家時，或論述陸學的章節之中，會用《師山集》中鄭玉對朱熹與陸九淵二人的評斷以說明之。百卷本《中國全史》的《中國元代教育史》中將鄭玉列為重要教育家，也別立一節來討論其人其事。可見百卷本《中國全史》則是將鄭玉歸於教育家。由上述二書對於鄭玉的記載來看，大陸學者或將鄭玉視為理學家，或視為教育家。本論文將從鄭玉的學思過程為出發點，不限「一家」地重新省視鄭玉的思想發展，以期能更周全地呈現出鄭玉思想的整體面貌。

大陸學者唐宇元〈元代的朱陸合流與元代的理學〉¹⁵中提出鄭玉合會朱陸，卻是偏於陸，¹⁶再以黃宗羲語王陽明「範圍朱陸而進退之」，¹⁷將明代王陽明與元代朱陸會同連成一線。周曉光於 1993 年發表〈宋元明清時期的新安理學家〉，說鄭玉的師承當屬陸學，但在會同朱陸時多右朱。¹⁸經筆者比對，唐宇元與周曉光對於鄭玉「偏陸」或「右朱」的學術性格有不同的看法，除了《宋元學案》中全祖望的斷語，兩位學者的判斷或許是從《師山集》中相關文獻裡各窺其一而就此遽斷。從鄭玉個案研究、與鄭玉相關的文獻討論中，已經能確定鄭玉學術思想最大的特色之一便是朱陸會同。既然在兩位學者的研究中出現歧見，本論文將立一章專門以鄭玉思想「右朱」或「右陸」的趨向進行分析。

周曉光繼〈宋元明清時期的新安理學〉一文以後，於 1994 年再發表〈論元末明初新安理學家朱升與鄭玉〉。¹⁹兩篇論文皆以「新安理學」為研究範圍，突出了元代區域性的儒學發展。前一篇文章論及元代新安理學並未出現朱升，後面這篇文章則將朱升與鄭玉並列討論。此中原因有三：其一是時代相近，兩人也有交

¹⁴ 秦志勇，《中國元代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

¹⁵ 唐宇元，〈元代的朱陸合流與元代的理學〉，《文史哲》，總第 150 期，1982.5，頁 3-12。

¹⁶ 同前註：「按照鄭玉的說法，朱陸兩家的利弊已如此清楚，惟有打破門戶，以匯綜朱陸二家之長。這自然是一種調和朱陸的議論。其實，有這種想法的，早在南宋的呂祖謙就談到過。不過他在朱陸之間的調和是偏於朱的，而鄭玉在論及朱陸時是偏於陸」，頁 5。

¹⁷ 同前註：「王陽明不僅承繼陸象山的本心論，而且也融合了朱學的一些內容，此即黃宗羲說的“範圍朱陸而進退之”（《明儒學案》）。王陽明這種兼融朱陸的辦法，不過是沿承元代朱陸合流的趨勢」，頁 12。

¹⁸ 周曉光說：「鄭玉的師承，當屬陸學。但他主張“潛心聖賢之書，進退仰俯，一隨其節”，沒有墨守師教，反而在“合會朱陸”中“多右朱，成為此期新安理學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見〈宋元明清時期的新安理學家〉，《中國哲學史》（1993.4），頁 97。

¹⁹ 周曉光，〈論元末明初新安理學家朱升與鄭玉〉，《中國哲學史》（1994.2，第 11 期），頁 83-92。

遊；其二是兩人對理學不獨尊朱；其三是周曉光注意到朱升與鄭玉的「實用」思想影響了明代及清代的新安理學家。〈論元末明初新安理學家朱升與鄭玉〉雖列出了兩人的著作，但礙於篇幅，並未作出仔細的處理。

至於「實用」這一特色，葛榮晉先生於 1994《中國實學思想史》²⁰〈元朝理學及其蘊含的實學思想〉（本章由唐宇元編）也未直接提及鄭玉。這一章主要談到的是朱陸會同的實學思想，文中舉了吳澄來論述朱陸會同的狀況，在論述中又提到鄭玉來加以補強。論述朱陸會同的狀況時，說：「到了宋末元代的鄭玉、吳澄、虞集等名儒，即以自覺的態度，對朱陸的分岐和對理學的危機，作了認真的反思」。論朱陸優缺點時又言：「持有這一觀點的，當以宋末元初的鄭玉為代表。」²¹這兩處論述與史載的鄭玉活動時間有所出入。鄭玉（1298-1358）一生活動的時間比吳澄（1249-1333）要晚，若以吳澄、鄭玉為元代朱陸會同前、後相關的重要人物，之間極有可能出現相因相承的關係。唐宇元未細究時代先後而進行以上論述，恐會造成思想承接上的錯亂。

與鄭玉相關的文獻研究中，至少能就以上研究成果窺得鄭玉某一種形象。學者們有的以為鄭玉是「理學家」，有的以為他是「教育家」，其實這兩者並不衝突，可以合起來看。教育者在傳道授業時，往往透顯出自己的思想特徵。至於現在已發表的單篇論文中，鄭玉被放大的形象除了為節義而死，仍以朱陸會同這一焦點為學者論述時的重心。會同朱陸的元代學者不只一人，故在參考他人文獻時，研究者必須清楚歷史的進程，對人物與人物之間的承接關係要有清楚認識，才不致於張冠李戴，得出錯誤的結論。

三、鄭玉所處之學術環境的形成與儒學發展

從現有的研究中，我們能看到學術環境具體形成的過程，也能一窺學術環境發展的具體內容。以下分成數個部分簡介鄭玉所處之學術環境的形成與儒學發展概況，第一是漢制漢法，第二是科考確定的過程與影響，第三是當時學界對於傳統儒學的承繼，第四是地域性儒學的發展概況。

第一，漢制漢法。以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入中原，用漢人、漢法，禮遇敦聘儒

²⁰ 葛榮晉主編，《中國實學思想史》，（首都師範大學出版，1994.9）。

²¹ 同前註，頁 581。

者進入官學體系的事實為討論範圍的有袁冀：〈元代之國子學〉²²、蕭啓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²³、丁崑健：〈元世祖時代的儒學教育〉，及大陸學者張廣愛：〈論元朝對儒學的崇尚——兼談當時知識份子的地位〉²⁴、張帆：〈元代翰林國史院與漢族儒士〉²⁵等文章。以上文章說明了學制制定之後，政治力對傳統儒學的承續產生的力量。漢人儒士有的為帝王師，有的入翰林院、國子監。元代初年，進入官學體系的儒者多是蒙古政府禮遇敦聘；而延祐年間（1313年）下詔開科，1314年復行科舉，另開了一條薦舉以外的出仕之路。

第二，科考確定的過程與影響。元儒必須面對蒙古人為政治上的正統，而蒙古政府為求「治」，持續輸入了儒學、儒士。王明蓀著《元代的士人與政治》²⁶，蕭啓慶〈元朝科舉與江南士大夫之延續〉²⁷皆站在儒者出路與制度間扣合的角度闡發其論述。

黃孝光在1978年發表的〈元代四書學〉²⁸，不僅強調了科舉制度對於朱學發展的影響，也是我目前能找到論述當時儒學義理最全面的論文。論文將近四萬字，比一般歷史學者的研究更接近經典本身內在的發展理路。作者論述了元初《四書》學的形成、元儒對《四書》學的見解與貢獻，還考證出元儒《四書》學的師承與特色，同時深入討論了學校、科舉與《四書》學間的聯結，最後以元代君臣與《四書》學的關係作收束。論文中強調的是開科以後產生的效應，開科以後，有意仕宦的知識份子必定要在《四書》上用力，因應科考實施，民間也出現以科考範疇為授課內容的書院。

第三，當時學界對於傳統儒學的承繼。元代統治者對於漢人經典的興趣一方面來自政治穩定的需要，一方面為經典中義理所吸引。上位者的決策往往影響到儒者的出處取向，因為這部分的研究繁雜多樣，所以下面將再細分為內聖外王的選擇、儒學發展脈絡、教育發展為研究成果回顧之細項。

²² 袁冀，〈元代之國子學〉，《元史研究論集》（台北商務，1974.9），頁203-235。

²³ 蕭啓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東方文化》，（1978），頁151-178。

²⁴ 張廣愛，〈論元朝對儒學的崇尚——兼談當時知識份子的地位〉，《文史知識》，第7期，1993.7），頁122-124。

²⁵ 張帆，〈元代翰林國史院與漢族儒士〉，《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第5期，1988），頁75-83。

²⁶ 王明蓀，《元代的士人與政治》，（台灣：學生書局，1992.3月）。

²⁷ 蕭啓慶，〈元朝科舉與江南士大夫之延續〉，《元史論叢第七輯》，中國元史研究會編，江西教育出版社發行，1999.4），頁1-19。

²⁸ 黃孝光，〈元代四書考〉，《木鐸》，第7卷期，1978.3），頁223-272。

首先是內聖外王的選擇。元代的學者，部分因為蒙古帝王的信任與需要，進入朝廷中心，藉著政治力在教育制度上提出建議；部分寄身山林，以講學的形式來發展儒學。元代政府開科取士，儒家經典的具體重要性相對被提升。然而，儒者在傳播儒家思想時，特別是由南宋入元的儒者，面臨了內聖與外王的選擇。此類相關的研究有發表於 1979-1980 年間，狄百瑞撰，侯健譯：〈元代朱熹正統思想之興起〉²⁹、黃俊傑：〈儒學價值系統中的兩難式——元代朱熹正統思想之興起讀後〉³⁰兩篇文章。

狄百瑞以朱熹學派中實用或操作性的「執政」，與朝廷和理學家間就「科考」所起的論爭來做為論文的發展脈絡。所謂的操作性就是指政治政策。他將理學的發展放在政治層面來考慮它的興衰。而黃俊傑則以「聖之任」與「聖之清」的觀點來論述元代儒士的出處。黃俊傑雖以專文回應狄百瑞的論文，事實上已有另一關心焦點，另開了士人進退的問題。文末點出元代當時經濟條件、出版事業等問題對儒學傳布也有影響。這兩篇論文若與劉祥光〈從徽州文人的隱與仕看元末明初的忠節與隱逸〉一文對照來看，可以得見歷史學家對於政治力如何影響了知識分子的進退充滿了高度的興趣。

政治力干涉的影響之大，使得性理之學被導向具「效治化」的性質。主政者透過政令的施行，不僅讓性理之學變成了晉身廟堂的工具，也藉此達到儒治、儒效的目的。不過，元代許多講學者不一定出仕為官，事實上，元代多數儒者終其一生都在講學著作中度過。但這些隱身於山林之間的講學者，透過講學與著作，不僅發揮了這些儒者的具體思維，也對儒學傳統中的「內聖」有傳續之功。

其次是針對元代的學術脈絡做人物與思想的舉要。這樣的論文，首推陳榮捷著、萬先法譯的：〈元代的朱子學〉。³¹此文將朱學視為元代思想發展的主流，陸學於元代處於隱而未聞的狀態。作者認為朱子是元儒所認可的「道統」。這篇文章的系統是在道統傳承上做發揮；陳榮捷以為會同朱陸原來是元代思想史中最容易開出一個新局面，吳澄與鄭玉則是最有機會發展出會同朱陸思想架構的儒者。可惜吳澄、鄭玉僅於此課題上點出朱陸各自的優缺點，並沒有調和的嘗試。

²⁹ 狄百瑞，〈元代朱熹正統思想之興起〉，侯健譯，（《中外文學》，8卷第3期，1979.8），頁66-76。

³⁰ 黃俊傑，〈儒學價值系統中的兩難式——元代朱熹正統思想之興起讀後〉，（《中外文學》，8卷第9期，1980.2），頁100-106。

³¹ 陳榮捷，〈元代之朱子學〉，萬先法譯，（《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4卷第4期，1981.4），頁9-19。

陳榮捷以「吳澄與鄭玉俱有意調和兩家道問學與尊德性所從入之途徑與態度，但在哲學意義上之調和，毫無嘗試」³²來論說這一段原可發展的學術脈絡，這與前面已檢討的劉桂林〈鄭玉教育思想新探〉論述相扞格。兩篇都是單篇期刊論文，鄭玉到底有沒有發展出具哲學意義的「朱陸合會」之說，有待本論文作出細部的研究。

以「元代思想史」為主題的專書僅有一本，為 1994 年大陸學者秦志勇著，《中國元代思想史》。³³此書是百卷本《中國全史》的其中一本，大致是以地域區分的方式將元代思想分為：元初北方理學傳播概述、元代江西、金華、浙東幾個區塊梳理理學發展的脈絡。這本書以三分之一的篇幅討論元初儒學發展，後面六章的討論較少。

秦志勇在書中指出理學是儒學的一種，元代基本上是繼承南宋朱子學來發展，這與政治力有極大的關係；至於陸學發展，秦志勇則提到了江西劉壘、陳苑，浙東趙偕三人，這三人的時代太接近，加上都選擇了隱居講學的生活，因此陸學在元代的影響的確有限。對於朱陸會同的問題，秦志勇以為元代是將朱陸之爭走向朱陸會同的關鍵，也是必然的結果。

孫克寬於 1953 年出版了《元初儒學》³⁴一書，只有八十七頁，這本小書年代久遠，是以「元代儒學」為題的唯一專書。這本書從第一章東平興學（1237）開始為儒學的源流做討論，對於蒙古人接觸儒學的狀態做了詳細的考究與分析。但在全書結論之處又說儒學的啓蒙時期約是 1213 年蒙古伐金之時，這與書中第二章之觀點——以為最先把儒學意識傳入蒙古的人，大多是金國的亡臣——互相比對，有一段觀念上的落差。作者作此一小冊，應該是要再發展出「元中期儒學」、「元末儒學」等著作，可惜他並沒有陸續寫出元代儒學全面性的發展狀況。

《中國元代思想史》、《元初儒學》所作的討論多囿於元代初期。《中國元代思想史》約九萬字，文中所舉趙復、許衡、郝經、劉因、吳澄、金履祥、許謙等人，都是元初儒者。論到浙東理學時，提及宋濂、劉基等人又已入明。因此，嚴格來講，元代中期到末期這一段的學術思想，仍是前人未曾積極開發研究的領

³² 同前註，頁 15。

³³ 秦志勇，《中國元代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計 159 頁。

³⁴ 孫克寬，《元初儒學》，（台北：撰者，1953）。他將元初儒學的尾聲定在元世祖至元 31 年（公元 1294）。

域。《元初儒學》的成書時間為民國四十二年，不到六萬字，全書未對元初儒學產生的影響留下伏筆，因此難從其中窺得元代中期、末期儒學發展的可能風貌，也是十分可惜。

孫克寬在 1964 及 1996 年間，再發表〈元代北方之儒〉³⁵、〈元代南方之儒試論〉³⁶兩篇論文。孫克寬兩篇論文關注的時間依舊偏重於元初，他將元初儒士分成數種形態，也將元代儒學成形的狀況做了初步的研究。依知識份子的分布及理學傳布的概況來看，南北二地的儒學流動與發展變化頗大。大致來說，朱熹理學原來在南方的聲勢很高，北傳以後，藉由執政者與漢儒的提倡，北方儒學的發展反而強過了南方；而南方距離政治核心較遠，各區域儒學自成一格，維持了與北方儒學或同或異的傳播內容。

1991 烏蘭察夫（段文明）的〈理學在元代的傳播與發展〉，³⁷討論了由窩闊臺時期到仁宗時候的儒學發展，是少數探討元代儒學對明代儒學發生影響的論文之一，文中點出宋元儒學不同之處，提供了往後研究者深究討論的線索。烏蘭察夫強調元代政府在政策上對於儒學發生的實際影響，再以地域性畫分南北兩方來論述朱學的變化，歸納出元代儒者與宋儒不同之處。這些不同點包括朱陸會同、經注特色、對「理」的詮解等等。文末，以元代理學為明清發展奠定思想基礎、社會基礎為結論。

1992 年，大陸學者徐遠和《理學與元代社會》出版。雖然題目將理學與社會扣合來談，不過實際上的論述仍以元儒的思想觀念來談理學在元代的發展。不同於以上兩本書，徐遠和改良《宋元學案》中的「學案體」，大致以魯齋學派、靜修學派、草廬學派、北山學派、徽州學派來討論元代理學發展，本書的討論方式不獨厚於元代初期，其涉及元代中後期的討論比前兩本書來得豐富。

在流變史專書中，除了葛榮晉主編的《中國實學思想史》另立〈元朝理學其及蘊含的實學思想〉一章，還有兩本思想史別立出〈元代理學〉一章：其一是 1997 年由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明理學史》，³⁸其

³⁵ 孫克寬，〈元代北方之儒〉，《孔孟學報》，第 8 期，民 1964.9 月，頁 125-144。

³⁶ 孫克寬，〈元代南方之儒試論〉，《孔孟月刊》，4 卷第 12 期，1966.8，頁 11-16。

³⁷ 烏蘭察夫（段文明），〈理學在元代的傳播與發展〉，《內蒙古社會科學文史哲版》，第 2 期，1991.3，頁 12-19。

³⁸ 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宋明理學史》，（大陸：人民出版社，1997 第二版）。

二是劉祥皓、劉宗賢主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儒學》。³⁹由以上專書的章節安排來看，大陸學者已將過去「宋明理學」概念做了更細緻的「宋、元、明理學」劃分。儘管以上章節的敘述文字比不上宋代、明代繁多，不過這些專書證明了大陸學者比台灣學者要早一步正視夾於宋、明間的元代儒學風貌。

至於教育發展，周祖謨〈宋亡後仕元之儒學教授〉⁴⁰將儒士們接受元代制度，而成官學體系教授的心態做了探討。至於元代教育狀況的專書，除了黃宗羲《宋元學案》與全祖望的補本外，大陸學者徐梓著《元代書院研究》⁴¹中別立了一章「書院官學化的派生物——學校化」，在定義上將元代書院與學校視為教育機構，是可供參考的資料之一。歐陽周的《中國元代教育史》⁴²提到，元代教育家與宋代教育家的差異並不明顯，同樣以儒家經典作為教授學生的典籍，至於儒學思想義理的部分，本書則未深入討論。

大體而言，元代的思想界基本上還是朱子學的天下。當時對於傳統儒學課題的承繼，不但鮮少發展而且分散，目前的學者都注意到這一點。至於南宋的朱陸之爭延續到元代的發展脈絡，現代學者鮮少以之為單一闡述的中心，殊為可惜。本篇論文將有一章是以鄭玉觸及的朱陸之爭問題為發散點，觀察元代初期與末期朱陸會同的變化。

第四是地域區儒學的呈現。何佑森〈元代學術之地理分布〉⁴³一文，以學術發展的角度去分析元代學術分布的地域狀況。該文依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將元代學術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各部之內再以地方、學者羅列出元代學術分佈的概況。在歸納各家時，對於鄭玉的師承加上了注解說明。師山學派導源於浙江，傳授則在婺源與歙縣，而鄭玉在元代經學的發展上是當時的大家。何佑森有此觀察，是因為鄭玉曾著有《春秋闕疑》、《周易大傳附註》。在史學方面，安徽的史學盛過江蘇；在文學方面，他以為安徽的子學以婺源為第一，歙縣為第二；安徽的文學家多在婺源、休寧二地。

³⁹ 劉祥皓、劉宗賢，《中國儒學》，（臺北市：水牛出版社，1995）。

⁴⁰ 周祖謨，〈宋亡後仕元之儒學教授〉，《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14卷第1、2期合刊，1946.12），頁191-214。

⁴¹ 徐梓，《元代書院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⁴² 歐陽周，《中國元代教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⁴³ 何佑森，〈元代學術之地理分布〉，《新亞學報》，第2期，1956.2），頁305-366。

何佑森還有一篇〈元代書院之地理分佈〉，⁴⁴這篇論文的研究成果是：將區域劃分的方式統計出元代書院的數量。這份資料統計出安徽地區有十七間書院。整體來看，元代書院的發展與學術發展是同一趨勢——南勝於北。這與孫克寬以為元初朱子學的發展是北勝於南，是不同的見解。而何佑森的研究結果讓人了解安徽地區的學風在元代並未衰退，還維持了鼎盛的狀況。又，學風鼎盛的原因似乎不僅是因為政治力強弱的原因，經濟的榮枯也是取決點之一。何佑森將元代學術的地理分布、書院的地理分佈以表格的方式呈現，對於學術區域性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總而言之，近代研究者針對學術環境的形成與儒學發展，做了許多的努力。參考《元史》與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得知，隨著新政權的產生，學術環境也產生了變化。由宋入元的儒者在中原地區以不同形式傳衍著漢族文化。初期，學術環境被強力維護成「漢式」的模式，部分儒者因為蒙古帝王對儒學的喜好，漸次進入政治核心，在教育面與制度面盡力維持漢人的地位。中期，透過科考的推波助瀾，朱學成了官學。而區域性的儒學不分時期地在地方上循著講學、問學、交遊的方式維持傳統。元代儒者或許未開出儒學的新局面，不過，他們究竟維持了儒學中的哪一些內容，卻值得我們探究了解。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本論文的研究主題在於鄭玉思想的全面性論述，討論課題分為儒學思想與朱陸會同兩大部分。前者著重於鄭玉在倫理思想、經學思想的性質，後者著重於鄭玉在朱陸會同思想發展中的歷史地位。

研究方法首先以文本入手，其次由文本中尋求思想發展的線索，再次則是徵引相關必要資料，將思想史中「抽象」的鄭玉地位重新塑出。要凸顯出鄭玉思想的時代性與其在思想史中的意義，先要將原典重新點讀，再循序漸進地梳理出其思想的關懷焦點。立於研究元代鄭玉儒學思想的基礎之上，必須把鄭玉與其時代做多面向的聯結；除了閱讀原典資料，史學界對於元代政治、社會文化層面的相關研究，對筆者判讀儒學在元代消長的原因有直接的幫助。在人物、時代、制度、文化趨向都確定以後，筆者將就此一部分的專書、論文做細部分類，再依研究計畫中所擬的章節做系統的梳理。以《師山集》為主軸，同時參酌目前可蒐羅到的

⁴⁴ 何佑森，〈元代書院之地理分布〉，《新亞學報》，2卷第1期，1956.2，頁361-408。

資料將學界研究中值得再發揮、再補充的部分一一提挈出來。

依前述的論文主題、方法，我擬出以下章別作為本論文的發展架構。首章為緒論。第二章、第三章將透過鄭玉的著作，依次提挈出其儒學思想、儒學實踐的過程與價值。鄭玉的倫理觀很接近先秦儒家在事上發揮的倫理觀，經史觀也建立於闡揚聖人之言的基礎上，綜合對於其倫理觀與經史觀的分析，將能歸納出鄭玉儒學思想的特質。第四章將釐清鄭玉在朱陸會同上的歷史地位。首先要梳理鄭玉「由朱入陸」或「由陸入朱」的始末；其次以《師山集》裡討論朱陸思想的篇章作分界點，考究鄭玉的朱陸會同思想是如何開始、發展、轉變、完成。確定鄭玉朱陸會同思想的始末，最後，論文將向上追溯元代初年、向下推及與鄭玉同時期或稍晚的元代儒者對朱陸會同問題的看法。這樣的作法除了具體說明元代朱陸會同的發展歷史，亦能客觀確定鄭玉在元代思想發展中的歷史位置。第五章的內容將以鄭玉的學術影響及其意義作結。鄭玉的學術活動時間一直延續到元代晚期，他的思想是否影響到明代學術的發展，或是成為元明之間一轉折的關鍵，是我將扣問的問題。

第四節 鄭玉所處的學術環境與著作概述

鄭玉（1298-1358），字子美，號師山，安徽歙縣人。⁴⁵一生活動的時間是蒙古政府將政治統治面、制度面確立的時期，主要的學術活動地點是中國南方徽州、江西、浙江一帶。《宋元學案》補本將鄭玉一脈的學者別立成「師山學案」，學案中記載了鄭玉的學術思維以及與其學術相關的人物。⁴⁶鄭玉自生至死都在蒙古政府造就出的學術環境裡活動。所以要了解鄭玉的學術背景，對於元代的儒學發展，必須有所了解。因而本節介紹忽必烈以後元代中後期的學術環境，並說明鄭玉於此時期完成的《春秋闕疑》、《師山集》二書之內容要旨。

一、學術環境概述

根據《元史》的記載與姜亮夫的考證，⁴⁷鄭玉生於 1298 卒於 1358。這六十一年中，皇位的嬗遞非常頻繁，鄭玉經過了成宗（1294-1307）、武宗（1307-1311）、仁宗（1312-1320）、英宗（1320-1323）、泰定帝（1324-1328）、明宗（1328-1328）、

⁴⁵ 本段敘述參酌明·宋濂，《元史》（臺北：中華書局，1966 出版，1997.7，第六刷），頁 4432。

⁴⁶ 明·黃宗羲著／清·全祖望補本，《宋元學案》（台北：中華書局，1984），卷 94，頁 1-8。

⁴⁷ 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台灣：華世出版社，1976，台一版），頁 388。

文宗（1328-1332）、寧宗（1332-1333）、順帝（1333-1370）等九個帝王。⁴⁸

蒙古人雖然入主中原，卻因皇位的傳承問題，朝中的內鬥與殺伐比起漢人朝廷要多得多，皇帝更替的時間也很快。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朝廷裡的角力戰不免延伸到朝廷之外。「以夷變夏」是其中一派的主張，但由於強盛的忽必烈王朝已開了「用漢人」、「行漢法」的風氣，在漢儒一個接著一個入朝為官的努力下，至少在教育制度、教育傳播、科考仕途的開發上，使得漢人保持了相當的文化地位。

元朝建立以前，忽必烈在潛邸時期⁴⁹就透過儒士與儒典，持續不斷地想了解中國這一塊陌生的土地。進入中原以後，他不僅想做蒙古族的首領，更積極地想做真正的中國皇帝，而在潛邸時期吸收到的文化知識對於他進入中國的文化領域有不小的幫助。從元朝立國到成宗即位，忽必烈共執政了三十五年，在元朝九十年的國祚裡超過三分之一的時間。本論文定義這段時間為元代初期。

元代初期，由於忽必烈大量起用儒者，對於儒學的態度也很友善，因此教育文化制度與宋代差別不大。元代初期的儒臣提供了漢文化傳統以資帝王貴族學習，並且一再向君王強調儒學儒治的必要性。元世祖以後的皇帝大都循著此一範式來進行國家機器的操作。

鄭玉是在成熟之儒學環境中長成的儒者。在他學齡之前，舉凡立國子學、各地學校的重建、儒學教育的發展，都在忽必烈掌政的三十五年間打下了一定的基礎。在忽必烈之前，憲宗朝有「給復儒士」一事。⁵⁰元代統一中國後，元世祖忽必烈任用姚樞、許衡、劉秉忠、竇默等人，從他們的身上學習漢人文化；即位以後令劉秉忠、許衡定官制，還以楊庸教授孔子、顏回、孟子後代，有「務要嚴加訓誨，經通經術，以繼聖賢之業」⁵¹之言。漢人文化的持續發展，使得漢人儒者

⁴⁸ 柏陽，《中國歷史年表》下冊，（台灣：星光出版社，1984，五版），頁1022-1057。

⁴⁹ 潛邸一詞，原指稱天子即位前所居住的宅第。這裡是指忽必烈成為中國皇帝以前的時間。

⁵⁰ 清·孫承澤記：「帝為皇子時，鎮西京儒者皆隸役，高智耀謁藩邸言：『儒者給復已久，一旦與廝養同役，非便，請除之，從其言。』及即位，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問：『儒家何如？』巫醫對曰：『儒者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元朝典故編年考》，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二集》，v.140，台灣商務，1971），卷1，頁8。

⁵¹ 清·孫承澤記：「中統元年九月，制孔氏、顏、孟之家皆聖賢之後也，自兵亂以來，往往失學，甘為庸鄙，朕甚憫焉。今以進士楊庸教授孔氏、顏、孟子弟，務要嚴加訓誨，經通經術，以繼

能在學問吸收上取得某種暢通的管道。

接下來的時間，元代政府對於儒學的鼓勵仍是強化大於削弱。《大元聖政國朝典章》⁵²裡載有世祖到英宗朝（1260-1323）興學校、教官遷轉例（儒學教授、山長等升遷選例）、吏制（儒吏）、學校（科學條例、儒學）等紀錄。泰定帝期間，吳澂有「今上皇帝丕續聖緒，動遵世祖、成、憲於崇儒重道惓惓也」⁵³之言，亦足見其證。鄭玉十數歲至三十歲以前，即元仁宗到元文宗年間，元代君主尚有進十儒從祀孔廟、追封孟子父母、追封孔子父母等等尊儒的具體作為。

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這五位皇帝對於儒學的態度友善，仁宗、英宗朝更明顯將元代儒者的地位往上拉抬。因此二十八歲以後的鄭玉，對於儒學知識的汲取容易，在為仕出處的進路上也有出口。泰定帝元年開經筵，大儒吳澄等人以儒家經典教授天子。漢人、漢法、漢文化從文教制度面上漸漸進入元代王朝核心。

若從整個元代思想史發展的地區來看，元代初年北方有南儒趙復以《傳道圖》、《伊洛發揮》、《師友圖》、《希賢錄》⁵⁴傳理學，許衡、郝經在朝中為儒學地位的制度化努力；不求仕的劉因，一生大部分時間也以儒家經典為傳播內容，在民間講學。江西金華地區的學者則繼何基、王柏的學術方向來傳播朱學，元代中期，許謙等人承北山學派續傳朱子學問，浙東則有宋濂再繼朱學發展。

相對於朱學的蓬勃，陸學的發展缺乏政治力的支持，因此無法取得良好的發展條件，它的發展區域也很有限。兩處重要傳陸學的地方，一是陸九淵江西本家，有劉壘（1240-1319）、陳苑（1256-1330）⁵⁵傳陸學，一是浙江四明，有楊簡後學

聖賢之業」，卷1，頁18-19。

⁵² 吳城，《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台灣：文海出版社印行，1964）。筆者按：一般人將此部典章制度稱為《元典章》。

⁵³ 轉引自清·孫承澤，「臣澂次當執筆：『今上皇帝丕續聖緒，動遵世祖、成、憲於崇儒重道惓惓也。』」卷3，頁5。

筆者按：憲宗蒙哥在1251-1259執政，世祖忽必烈在1260-1294執政，成宗鐵木兒在1294-1307執政。吳澂則是在泰定帝年間（1324-1328）作此文。泰定年間的鄭玉至少已過弱冠，與之交會的時期是1298-1328。

⁵⁴ 參〈趙復傳〉，《元史》，卷189，頁4313。

⁵⁵ 〈靜明寶峰學案〉，「隱君陳靜明先生苑。是時，科學方用朱子之學，聞先生說者，譏非之，毀短之，又甚者求欲中之，而先生誓以死不悔，一洗訓詁支離之習。從之遊者，往往有省，由是人始知陸氏學。……元儒如草廬調停朱、陸之間，石塘由朱入陸，師山由陸入朱，若篤信而固守，以嗣槐堂之緒，靜明、寶峰而已。」《宋元學案》，卷93，頁1。

與趙偕（?-1364）⁵⁶等儒者傳陸學。宗陸學的學者分爲兩種，一種是遵守家系與師承，在鄉里自成一格，另一種則是不滿士子將朱子學問作爲追求名利富貴的工具，因此轉向陸學的學者。在朱學盛行的學術風氣下，此兩種學者對於陸學的崇尚更需要堅持的努力。

浸淫在此種學術氛圍中的鄭玉，由青年步入壯年。其學術活動力的來源一方面來自於蒙古皇帝對儒生的基本尊重，一方面是家學與師承的影響。由於種種文教政策的逐步施行，儒家的典籍與制度取得了保存、增生的空間。以學習機構而言，除了國子學，各路、府、州、縣也都設立學校。另一不可忽略的重要資源，便是還有一批或仕或隱的南宋遺民以道自任，用儒家經典傳聖人之學。雖然遲至延祐年（1314年）元代政府才行科考，⁵⁷但是朱子之學透過書院來傳佈已經是一普遍現象。科考程式裡用朱注、考《四書》，⁵⁸對於理學的傳播有強化的效果，加上仁宗皇慶二年（1313）「獨缺陸九淵」地將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等人從祀孔廟，更是朱子之學成爲官方之學、陸學因此隱微不彰的原因之一。

鄭玉學術活動的時間都不離安徽、江西、浙江一代。鄭玉的文章在文宗與寧宗間的至順初年（1330-1332）曾受北山許謙之後學——揭傒斯、虞集、歐陽玄的賞識。⁵⁹趙汭、朱升與他的學術活動時間亦有重疊。元代的儒者，如揭傒斯、歐陽玄等在朝爲官的人不算多，大部分的儒者幾乎都不受元代皇室內爭鬥殺伐的影響，在漢人文化圈中自成步調地圍繞在孔孟之道、程朱理學、經學注疏等問題上做著書、傳播的工作。

儒學得以承繼，除了前述因君王禮遇儒生的原因以外，尚有默默耕耘，保持傳統的儒者在努力著。雖然多數學者以爲元代的思想發展無足可觀，不過，換個角度來思考，在完全異於前代的文化環境之下，大部分的儒者還能保存前代儒學傳統，這已是難能可貴之事。

⁵⁶ 同前註。「隱君趙寶峰先生偕。趙偕，字子永，忠惠公與□後，慈溪人也。學者稱爲寶峰先生。志尚敦實，不事矯飾，嘗習舉業，曰：『是富貴之梯，非身心之益也。』棄不治。」卷93，頁1-2。

⁵⁷ 西元1313年，元代政權下了科考詔命，1314年首行科考。

⁵⁸ 明·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台灣：三民書局，1968），卷8，頁44-46。

⁵⁹ 時鄭玉32歲。

二、著作介紹

鄭玉的著作透顯出知識分子在元人統治下極力維護儒學傳統的儒者精神。鄭玉一生有多本著作，不過，現今仍傳世的著述僅有《師山集》與《春秋闕疑》。《周易大傳附註》、《程朱易契》兩本著作已經不傳，前者於《師山集》中仍保有原序。以下依序就《春秋闕疑》、《師山集》的內容作概要介紹。

首先介紹《春秋闕疑》。鄭玉認為《春秋》為孔子所作，⁶⁰經文雖短，但是聖人微意常存其中。⁶¹因此，鄭玉除了謹守聖人作經的要旨，《春秋闕疑》參酌了《春秋》三傳與後代注家所記錄的歷史，以經文為主、以傳注為輔，對於孔子寄託的微意再作詮釋。

《春秋闕疑》的寫作條例是先列《春秋》經文，再列《左傳》、《公羊》、《穀梁》和後代人如孫復、胡瑗、孫覺、程頤、胡安國、家鉉翁等人的解釋。除了收集前人對於經文的相關詮釋，鄭玉對經文或相關詮釋若有看法，會將看法書於該經文或相關詮釋之後，而按語則一律置於該歷史所有詮釋的最後面。鄭玉的經注與按語，最常涉及君臣關係的討論。他參考前賢註說，經注與按語下得謹慎客觀，藉著歷史與聖人之筆，鄭玉在經典的基礎上，表達了他對君臣倫理的觀察。

對於鄭玉而言，「經」乃聖人之言，「史」乃漢代以來文人才士著作的產物。孔子以魯史作《春秋》，《春秋》作為一部經典，其內文不能改動，後人在魯史或經上所加的注說卻仍有補正的空間。故以經典為基礎，鄭玉於至正十四年著成《春秋經傳闕疑》一書，在至正十八年自殺之前，交待學生王季溫一定要將此書付刻傳世。⁶²鄭玉對於《春秋闕疑》一書原寄有傳世的厚望，可惜元末戰亂，自經而死的鄭玉未能完成他的心願，直至清代此書才付刻傳世。

⁶⁰ 將《春秋》定為孔子之作，是鄭玉的想法。鄭玉所作的按語：「愚按：孔子之作《春秋》，所以記天下諸侯之事，而非一國之史，雖用周以紀元，可也，蓋周有一代之定制，所謂時王之法。孔子安敢置可否於其間？惟託之於魯，然後可以損益三代之禮，因四王之事而為萬世之法也，然則《春秋》實夫子所以為治於天下，後世者特託魯史以成文爾」，參《春秋闕疑》，第1冊，隱公，卷1，頁1。

⁶¹ 「《春秋》雖美惡不嫌同辭，然聖人亦必有微意寓於其間」，參《春秋闕疑》，第4冊，成公，卷27，經文「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魴、邾人會吳于鍾離」下之按語，頁17。

⁶² 「予所註《春秋闕疑》幸已脫藁，若夫梓而行之，是則諸生之責也」，參〈屬王季溫刊春秋闕疑〉，《師山遺文》，卷3，頁14。

《春秋闕疑》卷末之後，有後人鄭肇記：

十一世伯祖子美公，學者稱師山先生。當元之末，著《春秋闕疑》四十五卷，稿藏於家，未經授梓，四方學者雖知有其書，以無板本購鈔不易。始，余求得稿本，中闕者十三卷，未為全書；既而，族孫經學以其父畋所藏全本來歸，蓋嘉靖中宗人獻文所手錄者。得之喜不自勝，思廣其傳，因急付之，削氏念是書之成已三百餘年，展轉收藏皆在族人之所，幸未至於零落，則先公精神所寄必嘿庇其間。而宗人後先鈔傳護惜之功，俱有不可沒者。

63

這段記載明確說了《春秋闕疑》的付刻時間。至於此書的寫作動機則可以參考鄭玉為此書寫的〈春秋經傳闕疑序〉。

《春秋闕疑》乃以《春秋》作基礎。由於《春秋》以簡潔的筆法紀錄了當時發生在諸國間的政治事件，所以後人通常依賴三傳的說解，才能了解春秋歷史。隨著三傳的傳世，越來越多人三傳的基礎上再作注疏，因此忽略了《春秋》經文本義。因此，鄭玉作《春秋闕疑》時，仍以《春秋》經文為旨歸，全書不煩徵引前人注疏，且不時地在歷史事件下，對前人的解釋再作梳理。遇到難解之處，則寧可「闕」之，不妄下臆測。遇到與某家某人之注持不同意見時，鄭玉則將自己的意見置於該注之後，或者在文末以「愚按」、「愚謂」來與其他人的經注作區隔。

再者介紹《師山集》。《師山集》是了解鄭玉思想的最重要著作。全書由師山集八卷、師山遺文五卷、師山遺文附錄組成。依據鄭玉的自序與程文的序來看，可確定此中由鄭玉親題的著作有師山集八卷、師山遺文五卷。在程文序中提及此編是至正丁亥年（至正7年，1337）完成，時鄭玉四十九歲；而鄭玉所作的〈餘力藁序〉，末題為至正庚寅，即至正十年（1350），時鄭玉五十二歲所作。再參王禕說的「漢唐諸論」，⁶⁴《師山集》全書中最早的文章必定在鄭玉四十歲以前寫成。

⁶³ 此段文字附於《春秋闕疑》卷45之後，未有記、跋、卷類的標題，但仍標記頁數為頁1。

⁶⁴ 元代王禕（1322-1373）師事黃潛，曾作〈書鄭子美文集後〉，有一段紀錄「漢唐史論」的文字如下：「鄭子美先生所為文，予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論』，頗病其辭不皆精純，而其體制往往或戾於法度，心未之好也。今年秋，復獲其《師山集》，盡讀之，觀其操議持論，務辨道理、談名義，蓋汲汲焉以扶植世教自見。心歎服之，於是乃愧向之知先生之不能深也！雖然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者，欲論先生者，當自其平生大節而觀之。」見於《全元文》，卷1686，第55冊，頁345。

《師山集》師山集與師山遺文中的篇章頗為零散，主要是各篇文章的著成時間無法直接掌握，必需要透過交叉比對，才能歸納出最可能的成篇時間。

師山集八卷的內容分為表、書、論、序、記、碑、碑銘、表誌；師山集遺文五卷的內容依次為序、記、論、辯、說、表、書、題跋、傳、銘、贊、辭、古詩、律詩、絕句；師山遺文附錄中收有《元史》等四十六篇後人對鄭玉的品評。《四庫全書珍本四集》在提要之後，將至正年間的程文的〈師山集原序〉放在鄭玉的〈餘力藁序〉之前。文集中涉及儒學思想的部分，大抵集中在史論、題、記、書、序等文類裡。

鄭玉多以日常生活的尋常事件為討論重點，極少涉及天人的討論。在儒學實踐的部分，文集中雖然推崇宋儒的成就，卻極少說明其心中儒學實踐的步驟。在朱陸會同的討論上，經過初步的整理，雖然直接涉及朱陸會同的篇章屈指可數，但是，藉著文集中各篇文章的著作時間推斷，仍能見得鄭玉對於朱陸會同此一課題的學思過程。然而，鄭玉對於這一主題的發言，是否承繼前輩學者的說法，可能還需要參照他的師承與當時學風的影響才能下判斷。至於後人表彰的詩文，全數集中於鄭玉在教育上的成就、調合朱陸的貢獻、寧死不屈的氣節這些主題上，其中又以鄭玉不屈明將自縊而死的事蹟為主題的論述最多。

《師山集》有鄭玉對個人內聖抱負的闡釋，雖說元代因為科考取士，《四書》成為仕進之路的敲門磚，但是在《師山集》卻多談六經，罕言四書。⁶⁵不過，他對於士君子的出處仍表示極度的關心，⁶⁶不僅看待漢人知識份子是如此，對於蒙古人亦同。由於鄭玉傳世的著作很少，因此除了原典之外，本論文勢必要透過經注與文集間互相交涉的部分為線索，才能具體呈現鄭玉儒學思想之要義。

本章旨在替第二章以後的論述作基礎認識的介紹。一方面概述筆者的研究動機、方法，以及相關的文獻回顧；另一方面則進一步指出鄭玉所處的學術環境對其思想形成的影響。又，由於以下各章將會把《師山集》、《春秋闕疑》的思想要

⁶⁵ 「以文章為學，古無是也。六經皆文章也，而不以為名，堯舜周恐皆文人也，而不以文聖，故所言皆文章也」，參〈胡孟成文集序〉，《師山遺文》，卷1，頁1。

⁶⁶ 「然其為學又豈必以捐世務而後為高哉」參〈上清靈寶道院記〉，卷5，頁17。

「士君子在天地間唯出處為一大事故。觀其出處之節，而人之賢否可知，雖然出處之際、禍患之來常有不可避者，君子亦曰『聽其在天者』而已」，〈送徐推官序〉，《師山集》，卷3，頁9。

義合在一起討論，因此在此分別概述兩本著作的大意，以備查考。

